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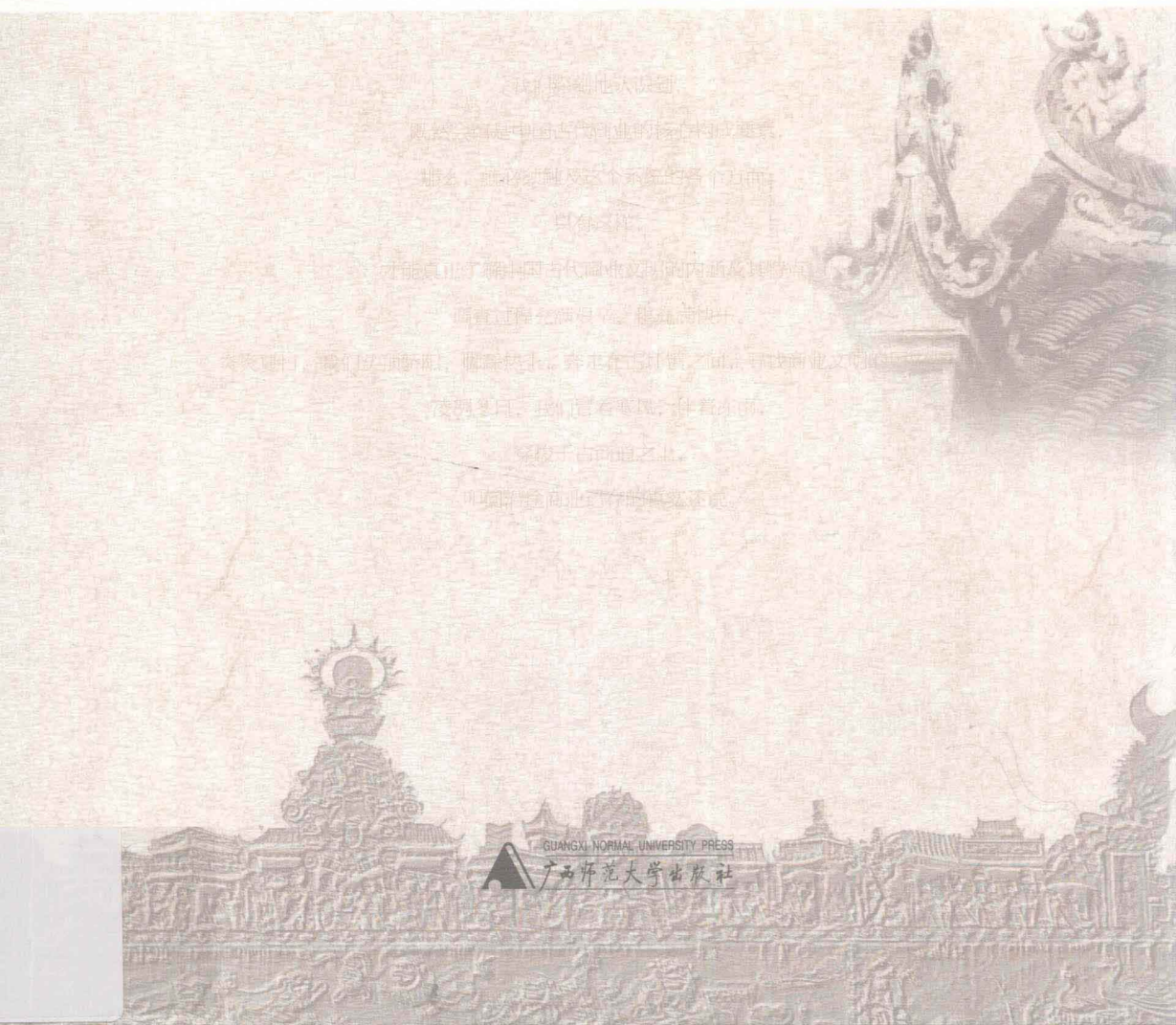
人文  
RWQG

人文强桂系列丛书

# 广西商业会馆研究

Guangxi Shangye Huiguan Yanjiu

唐 凌 侯宣杰 等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WQG

人文强桂丛书

广西师范大学“人文强桂”建设工程

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中心科学研究建设工程

# 广西商业会馆研究

唐凌 侯宣杰等 著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

既然会馆是中国古代商业的核心构成要素，

那么，就必须触及这个系统的各个方面。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内涵及其特点。

调查过程充满艰辛，也充满快乐。

炎炎夏日，我们头顶骄阳，脚踩热土，奔走于古城镇之间，寻找商业文明的历史痕迹；

凛冽冬日，我们冒着寒风，伴着冻雨，

穿梭于古商道之上，

叩问沿途商业遗存的真实述说。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西商业会馆研究 / 唐凌, 侯宣杰等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9

(人文强桂)

ISBN 978-7-5495-2371-9

I. ①广… II. ①唐… ②侯… III. ①商业会馆—广西—明清—时代 IV. ①F7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6772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服务电话: 0771-209286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1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1.75 字数: 360千字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绪 论 从会馆看边疆经济开发中的民间力量及  
商业史叙述语言的选择 / 001

广西商业会馆综合研究

第一章 商业会馆与广西边疆社会经济的变迁（1600—1949） / 022

- 一 商业会馆：透视边疆社会经济变迁的新维度 / 022
- 二 明清客商入桂与商业会馆的勃兴 / 040
- 三 商业会馆与16至20世纪广西社会经济的变迁 / 065
- 四 双重视野中的广西商业会馆演化史 / 096

第二章 “康乾盛世”的民间证明——以广西商业会馆为中心的考察 / 103

- 一 商业会馆是促进“康乾盛世”形成的民间力量 / 103
- 二 从广西商业会馆的时间分布看“康乾盛世” / 104
- 三 从以会馆为中心的商业空间结构透视“康乾盛世” / 138
- 四 “康乾盛世”的民众特征 / 142
- 五 康乾时期广西商业会馆兴盛的原因 / 149
- 六 结语 / 158

## 广西典型商业会馆研究

### 第一章 平乐县商业会馆考察记 / 160

- 一 三个重要会馆的基本特征 / 160
- 二 平乐县商业会馆利用现状评析 / 170

### 第二章 贺州商业会馆历史考察报告 / 173

- 一 黄田镇路花村三界庙与庆元会馆、珠端会馆 / 173
- 二 八步镇仙城会馆 / 178
- 三 黄田镇湖南会馆 / 178
- 四 贺街粤东会馆、码头和魁星楼 / 180
- 五 基本结论 / 183

### 第三章 戎圩粤东会馆与两广区域经济交往 / 186

- 一 广东商人入桂经商的原因 / 186
- 二 粤东会馆的建立 / 188
- 三 从戎圩粤东会馆透视两广区域经济的交往 / 191
- 四 戎圩粤东会馆的历史地位及其现代价值 / 196

### 第四章 清代以降三江会馆与桂中社会经济发展 / 199

- 一 三江会馆出现的背景和动力 / 199
- 二 三江会馆的设立及其相关因素 / 209

三 三江会馆的社会功能和影响 / 232

四 结语 / 249

**第五章 粤东会馆与百色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关系探微 / 250**

一 商业会馆：民族经济融合的产物 / 250

二 百色城发展历程及其相关因素 / 251

三 粤东会馆建立的原因 / 252

四 百色粤东会馆建立对百色经济发展的影响 / 255

五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力量的新认识 / 259

**第六章 商业会馆与周边地区社会变迁研究**

——以龙胜瓢里湖南会馆为中心 / 264

一 位于湘桂古道的瓢里 / 264

二 瓢里湖南会馆的建立 / 266

三 瓢里及周边地区的商品资源 / 267

四 会馆、会期与周边社会经济的变迁 / 270

五 湘商对桂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起到积极的作用 / 274

**第七章 大安粤东会馆的建立与圩镇商品经济的发展 / 275**

一 大安粤东会馆建立的历史背景 / 275

二 会馆的建立对大乌商品经济的影响 / 278

三 大安粤东会馆提升了当地圩镇的经济地位及社会影响力 / 283

## 第八章 下雷羊城书院摭谈 / 285

### 一 碑文解读 / 285

### 二 下雷地望 / 286

### 三 书院变迁 / 288

### 四 粤商后代 / 290

## 广西商业会馆碑刻资料的利用价值及选辑

### 第一章 商业会馆碑刻资料的历史价值

#### ——基于17—20世纪广西经济移民活动的分析 / 294

#### 一、商业会馆碑刻资料属少有的记载商业历史活动的民间文献 / 295

#### 二、商业会馆碑刻资料蕴含着十分丰富并具有突出特色的历史信息 / 296

#### 三、商业会馆的保存状态决定着碑刻资料的数量与质量，考量着政府和民众的智慧 / 304

### 第二章 广西商业会馆碑刻资料选辑 / 308

#### 一 记事碑 / 308

#### 二 捐款碑 / 316

#### 三 契约碑 / 334

#### 四 禁约碑 / 337

#### 五 义冢碑 / 337

### 后记 / 339

## 绪 论 从会馆看边疆经济开发中的民间力量及商业史叙述语言的选择

本书希望从历史学的角度，以整体与专题结合的方式，向人们展现 17—20 世纪广西边疆经济开发中会馆的作用，引发人们对民间力量的重视与思考，探索商业史新的叙述方式。

**一、会馆是中国古代商业系统的核心要素，围绕会馆而开展的活动主要是民间行动。通过对民间商业活动的考察，有助于从新的视角认识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中国，边疆开发是随着移民运动的发展而逐渐推进的。明末清初（16—17 世纪之交），商业是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主要标志之一。广西的商业会馆大都为外地商人所建。商人修建会馆不仅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还把会馆作为存放货物、议事定策、联谊乡情和宣扬商业文化的场所。因此，会馆承担着多种社会功能。会馆大都建在交通相对发达、人口相对密集、市场相对繁荣的地方。在会馆附近，商人还修建了商铺、骑楼、仓库，并通过带头捐款捐物等方式，调动社会力量修建了码头、公路、桥梁、街道、戏台、庙宇、魁星楼等建筑，以营造商业环境，促进商业发展。这些设施与会馆构成了一个整体，多元化地体现出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特征。会馆是中国古代商业系统的核心要素。在商品交易过程中，许多活动都在会馆及其周围进行。同时，当地的政府和民众往往借助会馆力量汇聚各种商业资源，加强民族的交往与融合，稳定市场乃至社会政治秩序。因此，要认识边疆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就必须深入研究商业会馆。

商人修建会馆是一种民间行为。围绕会馆而开展的活动主要是民间行动。历

史的发展需要动力。商业会馆是中国边疆经济开发中非常重要的民间力量。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人们对历史运动过程中民间力量的作用缺乏应有的关注,这就导致了对历史动力的认识不够客观、全面。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商业会馆,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另外,既然会馆是中国古代商业系统的核心要素,那么,通过对这个系统的研究,人们不难发现,商品的交易过程并非只是简单的买与卖,其背后需要大量的社会因素予以支持。而社会因素由于受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时代的烙印。因此,商业发展的历史,必须依据不同时期的商业系统结构选择相应的语言进行叙述。换句话说,除交易本身需要利用文字语言表现之外,与商业有关的码头、道路、桥梁、商铺、骑楼、仓库、戏台、庙宇、魁星楼等非文本因素的介绍,都应成为表现商业发展历程的基本语言。

历史发展动力是历史科学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及重点问题之一。从古至今,人们对此的回答各式各样。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无可否认,这个观点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强的指引性。但必须指出,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过程,人们过去往往从政策、法令、制度、组织保障等方面进行透视,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关注的重点不得不放在上层建筑上。缺乏民间层面深入观察的商业史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偏见及错误的。民间活动是最能真实地体现社会生产和生活变化的因素,因为这种活动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渗透力大,直接关系到民生及国家发展,活动的成效最终都会反作用于上层建筑。因此,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又要更新研究方法,通过对民间商业活动的考察,寻找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验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做出科学论述。

17世纪以来,广西经济开发中外省商人修建的商业会馆及其相关设施,可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民间力量提供新的视角,也可为我们表现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史提供新的叙述语言。

## 二、明末清初,在移民运动的推动下,广西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商业。会馆的建立,表明民间力量在广西经济开发中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商业会馆的建立,是边疆地区经济开发中的重要转折点。

广西地处祖国边陲,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状态,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商业基础更是薄弱。地方志资料显示,直到明末,广西绝大部分地区的交易基本上处于“日

中而市”的水平。碑刻资料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桂林石刻》<sup>①</sup>《灵川历代碑文集》<sup>②</sup>《宜州碑刻集》<sup>③</sup>等,是广西目前所能见到的以市、县为单位收集的内容最丰富、种类最齐全的历史碑刻集。其中,桂林清代以前的碑刻共 1066 方,涉及商业活动的仅 3 方;灵川清代以前的碑刻共 116 方,涉及商业活动的仅 4 方;宜州各朝代的碑刻共 140 方,涉及清代以前商业活动的没有 1 方。桂林是当时广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灵川位于桂林附近,是湘桂走廊的必经之地;宜州是桂西重镇。显然,这些市、县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其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应相对较高。而事实上,这些市、县历史上却很少有商业活动的记载。这足以说明,清朝以前的广西社会经济是十分落后的。

进入 17 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移民因躲避战乱、寻找新的生产和生活空间等原因来到广西,其中,桂林及其周边地区的移民以江西、湖南、广东等省迁移过来的为多,如桂北地区的全县(今全州县)清中后期人口约 38 万,共 100 多个姓氏,“原籍多系湘、赣、宁、浙等省,始迁时代大半在宋元及明”。<sup>④</sup>平乐府城“以黄、张、陆、吴、莫、马等姓为大姓,吴姓于明代迁来,其余各姓皆于清代由湖南、江西而来”。<sup>⑤</sup>修仁县(今荔浦):“清代迁来者,有许、蔡、蒙、石、孙等一百三十二姓”,其中,“来自广东各县者,有姓六十,中以恩平、南海为多;来自湖南各县者,有姓三十九,中以永州、衡州为多。”<sup>⑥</sup>桂中地区的融县,清代由湘、粤迁来者有周、潘、叶、肖、刘、罗、黎、张、陆、吕、谢、苏、施、唐、董、秦、郑、钟等姓。约 20000 人。<sup>⑦</sup>桂东南地区的移民,则以广东省的为多。如贺州,乾隆以来。“东省潮嘉诏庶,挈妻抱子,寄托我疆,布满原野,田我田,宅我宅”。<sup>⑧</sup>嘉庆年间,梧州、浔州、郁州三府来自广东等省寄居入籍者,“几占土著之半”。<sup>⑨</sup>

在广西,明末清初才有严格意义上的商业。众所周知,商业是通过商品交换获取利润的过程。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往往是以本地的物产为基础,以

① 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内部交流),上、中、下册,1977年。

② 曾桥旺编:《灵川历代碑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③ 李楚荣编:《宜州碑刻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

④ 唐载生、廖藻总纂:《全县志·人口》(民国版),第二编,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⑤ 张智林、罗玉槐纂:《平乐县志》(民国版),卷二。

⑥ 蒙自鹏:《广西通志稿·氏族》,卷十一。

⑦ 《融县志·社会、民族、姓氏、户口》(民国版),第二编。

⑧ 《贺县志》(光绪版),卷七。

⑨ [清]孙玉庭:《延厘堂集·奏疏》上,清刻本,转引自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717页。

满足生产和生活的基本需要为目的。虽然有买卖的行为发生，却很难产生利润。只有长途贸易才使不同地区的商品真正具有互补性，产生地区差，形成商业利润。明末清初，外省商人开始在广西寻找市场。平乐粤东会馆是广西最早的商业会馆，立于馆内的《重修会馆并戏台碑记》中记载：“会馆之设创自明，第沧桑以前无可考”。顺治丁酉年（1657）开始划地修建，直至康熙丁丑年（1697）才最终建成。接着，在西江、桂江流域及其相关支流的圩镇里以及重要陆路交通要道旁，陆续出现了各省商人修建的会馆。至民国时期，在广西设立的商业会馆共260多个。

广西的商业会馆，大都按修建者的省籍划分，其中，粤东会馆128个，约占49%，湖南会馆44个，约占17%；江西会馆36个，约占14%；福建会馆13个，约占5%；浙江会馆6个，占2%；云南会馆5个，约占2%；其他会馆合计28个，约占11%。<sup>①</sup>由于会馆具有多种功能，因此有的也以“某堂”“某书院”称呼。所不同的是，这些“堂”“书院”的主导者始终是商人，也就是说，会馆的基本属性始终没有改变。会馆的建筑风格各异，昔有民谣曰：“湖南会馆一枝花，粤东会馆赛过它。福建会馆烫金箔，江西会馆笔生花。”可见，广西绝大多数会馆都是由外地商人修建的。这些会馆的修建，表明外省商人在广西已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获得了较广泛的市场，民间力量在广西经济开发中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 三、会馆的建立壮大了经济移民群体，逐渐改变了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传播了先进的观念和经营方式，使码头、公路、桥梁、街道、骑楼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加快，边疆经济开发的整体水平因此而提高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外省商人在广西修建会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一）为边疆经济开发组建了日益强大的队伍

会馆修建之后，外省商人就成功地为商业网络编织起一个个重要的支点。以此为依托，就可把外地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到此推销，同时又把本地的土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外省发售。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商人群体逐渐执掌本地市场之牛耳。清代中后期，桂东南的许多圩镇几乎成为广东商人的天下，“无东不成市”的民谚充分反映了这种状况。<sup>②</sup>在桂北地区的许多圩镇，湖南、江西

<sup>①</sup> 依据地方志资料及广西师范大学地方民族史研究所近10年的实地调查资料统计，会馆的实际数字应不只260个。

<sup>②</sup>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16页。

和广东商人也基本成为市场的主宰,虽然没有达到“无湘、赣、粤不成市”的地步,但其作用远远超过本地商人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如桂林“城中江右,楚人侨寓居者十之九,构竹为庐,贸易止鸡、鸭、鱼、羊、豕之类”。<sup>①</sup>全县城“操奇赢,坐廛市,走舟船者,皆非土著”。<sup>②</sup>修仁、平乐一带“城中聚处,五方流寓,东粤三楚为多”。<sup>③</sup>与商人群体同时壮大的,还有为商品贸易服务的其他行业的经济移民群体,例如,为商品贸易加工的手工业者、为商品运输的挑夫及船运业者;为来往商旅提供食宿的餐饮业和旅馆业者;为商品中转流通提供短期或长期存放服务的仓储业者;为商人资金周转提供帮助的典当业者;为大宗或复杂商品贸易提供信息的经纪业者等。毫无疑问,商业会馆的建立,为长途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长途贸易又促使经济移民整体力量大为增强。若把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大致的时间界标,把经济移民的数量和能量前后进行比较,则不难发现,进入17世纪后,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外来移民的数量明显增多,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商业领域的作用明显增强。据统计,从乾隆十四年(1749)到五十一年(1786)的短短37年时间里,广西人口由3687725口增长为6647000口,<sup>④</sup>几乎翻了一番。在桂江和西江流域的大小圩镇里,外籍商人的踪迹处处可见。无可否认,清朝初年,社会较为稳定;统治者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重视边疆开发,解除矿禁,大力发展边疆地区的交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削弱土司势力,强化“流官”权利,打破社会的封闭状态,鼓励不同民族相互学习、交往、融合,等等,这些是导致广西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的大量到来,这种增长速度是很难达到的。商业会馆的普遍建立,不仅使长途贸易的格局得以形成,从事商业的外地商人逐渐在边疆地区定居下来,更重要的是还使越来越多的人依靠商业谋生。人是边疆开发中最重要的因素。在16—17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里,商人是最有经济实力,同时也是最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群体之一。他们进入广西边疆的时间虽然较晚,人数也较有限,但是由于具有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经营方式,很快就把大量的本地人吸引到商业或与商业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其他行业中来,这就为经济移民力量的增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边疆地

① 谢启昆:《广西通志·舆地略五·分野》卷八十四。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文献室点校本,第五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2705页。

② 清《全县志》卷一。

③ [清]胡醇仁纂修:《平乐府志》卷四。

④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362—366页。

区的自然和社会条件都远不及内地，外来经济移民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商业会馆的普遍建立，对移民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使他们能获得在边疆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从这时起，广西边疆的经济开发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衡量边疆经济开发是否取得成效的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有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融入边疆地区的社会之中，并利用该地的资源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历史事实证明，虽然组建和壮大边疆经济开发队伍不是商人的自觉行为，但是会馆的普遍修建，却客观上起到了这种作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民间力量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重要性。

## （二）改变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密切了边疆与外界的联系

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延续了上千年，直至 17 世纪前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广西，由于社会内部缺乏经济变革的机制和力量，外部缺乏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方式的刺激，不仅第三次社会分工迟迟未能实现，而且第一和第二次社会分工也不明显，原始、单一的小农经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会馆普遍建立后，商业逐渐兴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受此影响，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被逐渐改变了，随之，生产方式也逐渐地多元化起来，素来“鲜少商贾”的广西城镇出现了许多新的行业。关于这一点，只要对各会馆留下的记事碑和捐款碑名录做一分析就会看得很清楚。当时，为会馆修建捐款的，除商人个体外，主要有以下店行：一是小百货行。其经营者要么本身就是外省商人，要么依靠销售外省商品为生。店号里摆卖的大多数是由外省批发而来的商品，如绸缎、布匹、瓷器、海味、鱼肉、干果、杂货等。<sup>①</sup>从创办开始，就时刻以外省行业为发源生存的依托，又时刻受外省行业支配，一旦游离外省行业就会寸步难行。因此，会馆修建时，他们的经济实力虽然有限，却十分积极主动地捐款，数额从 1—10 两白银不等。二是专门性收购行。这些行店基本为外地商人举办。日常业务主要是收购广西各地的农林土副产品，接着再销售到外省。它们实际上是外省相关行业的分店，换句话说，是外省相关行店在广西的延伸。如土产行店主要收购四邻农村运来的油、糖、豆、谷、米、麦、山货、药材等，每年运到广东、湖南等地，有时还转销澳门、香港。仅道光十九年（1839）以粤商为主的江口捐资商号中就有 31 个花生行店，<sup>②</sup>这类行业为修建会馆的捐款通常都达数十两。三是手工业行。这些行店大多也是外省商人建立的。如在平乐府城，设有陆和榨行、联兴榨行、

① 《重修会馆并戏台碑记》，现立于平乐县粤东会馆。

② 饶任坤、陈仁华：《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36—37页。

弓箭行等。<sup>①</sup>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0),苍梧县戎圩通常有十多间面条加工作坊开业,如“邝同记、黄德昌、利泰昌、李裕兴、李源和、瑞泰、古会记、李森记、冯云兴等,全是广东人经营的”。<sup>②</sup>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抽酱味菜系的发源地,清代广西各市镇上久负盛名的酱料手工业作坊,大部分都是粤商经营的,如柳州的酱料手工业作坊,粤商约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就开始在此经营,比较著名并一直坚持到民国末年的有和源华、福兴祥、董太和酱园等。<sup>③</sup>会馆修建时,这些行店的捐款,少的数两,多的也达数十两白银以上。四是水面行及船运行。嘉庆二十年(1815)平乐府城粤商重修粤东会馆,新会、番禺、佛山、顺德等地就多达31行(号、店)捐资。其规模通常较大,资本也较雄厚,因此捐款数量也相对较多,如“东昌船行捐银78两8钱,东升号捐银10两,船聚店捐银27两3钱6分,联益牌捐银36两正,益胜号捐银10两零6钱”等。<sup>④</sup>水面行及船运行是由各江流动的行商水客组成的运输行业,其主要作用是促进城镇及地区之间货流。该业人员并不常年固定在某市镇坐肆,而是奔波往返于不同的市场之间,他们的经营活动使广西与外地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以上列举的只是直接参与会馆修建的一些行业,实际上,与商业密切相关的行业远远不只这些。仅从上述情况就足以看出,随着商业会馆在广西各地的修建,不少行店(如百货行、手工业行和水面及船运行等)已经基本脱离农业独立发展起来,一些行店(如专门性的收购行)虽然仍与农业有着较紧密的联系,但其独立发展的特征已基本具备。农业的兴衰固然会对其产生影响,却不能取代其作用。更重要的是,商业贸易的繁荣,使这些行业与外界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外地市场的不断变化,都会对这些行店的经营产生各种影响,从而促使经济结构进一步多元化,例如,19世纪中后期,北海、龙州、梧州等城市相继开埠通商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收购行店中,有的开始专门负责收购外国市场所需要的牛皮、猪皮、八角、茴油等土特产品;百货行中,出现了经营煤油、洋蜡、玻璃等外国商品的现象;水面及船行中,轮船运输的作用日益凸显,船坞业也开始兴盛等。可见,商业贸易造就了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结构,反过来,经济结构的改变又给商业贸易提供了新的动力。17世纪以来,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及优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不同区域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是市场机制得以形成及完善的重要反映。在广西边疆地

① 《重修会馆并戏台碑记》,现立于平乐县粤东会馆。

② 饶任坤、陈仁华:《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36-37页。

③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第一册,1950年。

④ 《重修会馆并戏台碑记》,现立于平乐县粤东会馆。

区,这些进步因素的滋长,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会馆的建立。各地商人以会馆为依托,调动民间力量,不断拓展商业的领域,培育市场,逐渐冲破自然经济的束缚,促使新的经济行业不断出现,进而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使边疆地区的市场融入国内外市场之中,初步形成了开放的态势。

### (三) 开化了边疆地区的社会风气

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长期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加上自然条件的局限和文化教育的缺失,造成民众的思想观念落后,惧商、厌商、鄙商的现象比比皆是。当粤商、湘商、闽商、赣商、京商、晋商、浙商等在全国各地携金带银、聚货纳物、开疆拓土、叱咤商场的时候,桂商却很难找到踪影。据研究,17世纪至民国时期,真正属于广西籍的商人,只有黄嵩安及其家族。其创办的“黄恒棧”商号,从兴盛到衰落,只有半个世纪的时间。<sup>①</sup>其余的近代广西商人,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各圩镇里从事商品贸易的本地人,基本属于小商小贩,在市场处于最低层,其主要工作是为外地商人的长途贸易提供中转及集散服务,没有属于自己的主导行业,也没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和生产品牌,无法成为“商人”的代表。这就是到目前为止,“近代桂商”这一概念难以确立的根本原因。<sup>②</sup>2005年,艺术家沈丰明先生依据历史文献资料,将桂林籍以及在桂林活动过的外省籍历史名人以“亦画亦史”的方式表现出来,创作并出版了《历史文化名人在桂林·画集》一书,书中共介绍了80余位历史人物,其中,只有一位江西籍商人——卢燕南被列入桂林历史文化名人,<sup>③</sup>其余都是政治、文化和军事人物。这并非偶然,而是广西社会崇文重政、轻商抑富现象的必然反映。在广西所建的260多个会馆中,只有少数几个由玉林五属的商人修建。值得注

---

① “黄恒棧”商号开始在百色以经营烟为主,进而向内地百货业扩展,最后面向东南亚市场发展对外贸易。“积累了大量资本财富,拥有四艘现代运输轮船,八台客货运输汽车以及数家工厂,其产业资本占当时广西私人资本第五位”。该商号的兴盛主要是清末民初,尤其是抗战时期。也就是说,“黄恒棧”商号是利用战争和对外贸易的时机发展起来的。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地处边陲的广西相对安定,加上抗战时期广西是通往东南亚各国的必经之途,黄氏家族利用这一时机,以及桂西地区丰富的土特产资源,将“黄恒棧”商号建成一个有影响的近代企业。后因决策失误,迁移到香港,失去了货源,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失去了东南亚市场,“黄恒棧”商号被迫解体。见杨业兴、黄雄鹰主编:《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114-143页。

② “近代桂商”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桂商”,应指在广西本土成长起来的有实力有影响的商人。广义的“桂商”,则把在广西从事商业的外地商人算在内。因其流动性大,定为“桂商”显然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③ 卢燕南(1913-1997),江西吉安人,出身商人之家,中学毕业后随父在湖南、广西经商。在桂林创办宇烟厂、鑫牛棉布号、万丰庄等企业。被推为江西旅桂同乡会会长,桂林商会第十九届董事长。见沈丰明:《历史文化名人在桂林·画集》,新世纪出版社,2005年,138页。

意的是,桂东南地区是当时经济移民最集中的地方,这几个会馆严格说来并非广西商人的产物,而同样也是外地商人所建,只不过他们进入广西的时间更早一些,习惯称自己为广西人罢了。对少数民族而言,长期封闭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使其习惯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长期受歧视和欺压,使其对外人深存防范之心。瑶族的石碑制规定:“众石碑人,若众商面熟有字号,方准担货入瑶。若假伪客商,以做匪为实,石碑查之,决不容情”。<sup>①</sup>在壮族聚居区,长期以来普遍流传着“生意眼前花,锄头落地为庄稼”和“三天无生意,伙计吃伙计”的民谣,不到万不得已,民众不外出进行商品贸易,对进山从事商品贸易的外地商人,尽量不与之打交道,生怕被欺骗。<sup>②</sup>因此,当商业成为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商品交易仍然存在较大困难。17世纪以来,随着会馆的不断建立,市场网络逐渐完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更新,社会风气逐渐改变,不仅汉族地区日益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也日趋繁荣,民族关系日益融合。《庆远粤东会馆碑记》记载云:“庆远辟在省会之西……自经兵燹瘴雨烟蛮,商旅憊而裹足,我朝重熙累洽,德被遐荒,俗易风移遂乐土,百余年来直穆然,徒见山高而水清矣!今又得贤守长,悉皆仰体皇仁,加意柔远其各安,乃口祇乃事惟务,经营以资生计,一遵有司之教,令勉作圣世之善良,是固区区之诚所厚期焉者。至于异地同乡,匪亲亦亲,匪故亦故,尚基冲和辑睦,相勉相规。时而载酒牵牲荐于神前,神锡尔福,酌于长者,长训尔箴,则登斯堂也,情联气洽,永歌得所,其喜洋洋已!”<sup>③</sup>又如西林县南端的达下村,自从乾隆年间广东商人的“龙头船”驶入村寨江边码头后,商业贸易规模不大扩大,接着,粤商又在此建立了会馆、书院、观音庙、龙王庙、盐仓、盐场等设施。随着商业功能的不断强化,这里成为桂西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文化传播源之一。该县西平乡八柴寨,在商业贸易的带动下,日益繁荣昌盛,清末民初已有“小香港”之称。民房自然排列成街,街上半部属云南,下部分属广西,街中间是一列长长的圩亭。每逢圩日,会集云南、广西两省边界货物于此。该街农民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田而不耕种,家家户户设门面,摆摊经营商业。<sup>④</sup>商业会馆之所以能成为开化边疆地区社会风气的重要因素,

① 《六十村石碑》。该石碑1914年立于金秀县金秀村大石碑头人陶道进家。见莫金山著:《瑶族石碑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348-350页。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202页。

③ 《庆远粤东会馆碑记》,碑高1.8米,宽0.8米,楷书,现存宜州市文物管理所。

④ 陆辉主编:《西林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352页。

是因为它能在当地迅速、有效地汇聚商业资源,扩大市场空间,使从事商业贸易或为商业贸易服务的人获得经济效益。不仅如此,每逢圩日,会馆通常都组织戏班开展演出活动,吸引四周乡村的民众前来观看,在此过程中,利用各种形式宣扬商业文化,引导民众向往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及时传递市场信息,使商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圩镇是商业发展的基础。当商业利润的驱动力不断强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资源不断得到开发与利用的时候,一个个圩镇就会焕发出勃勃生机,社会的整体风气就会不断发生变化。会馆作为边疆经济开发重要民间力量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它们大都以圩镇为依托,以先进的观念和经营方式影响最基层的民众,瓦解小农经济基础,创设出边疆地区社会近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商业认同观及商业运作方式,为现代桂商群体的出现及壮大奠定社会基础。

#### (四) 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地区社会基础设施的改善

随着会馆的不断修建,码头、公路、桥梁、街道、商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也逐渐加快。例如,灵川县大圩镇共建有13个水运码头,自东向西排列依次为寿隆寺码头、更鼓楼码头、清真寺码头、社公码头、石矶码头、大码头、渡船码头、狮子码头、塘坊码头、五福码头、秦巨利码头、鼓楼码头、卖米码头,<sup>①</sup>街道有老圩街、地灵街、隆安街、兴隆街、塘坊街、鼓楼街、福星街、泗瀛街等。这些街道宽2.5米左右,全用青石板铺设而成。<sup>②</sup>大圩商铺林立,鼎盛时期曾达306家,比一般县城的商铺还要多。按其资本额大小,大圩的商号又分为“四大家”“八中家”“二十四小家”以及众多其他商号。<sup>③</sup>平南县大乌圩,乾隆年间已发展成为“上接平贵、下通藤容、四方客商云集”的大都会。嘉庆年间圩中有店、当、馆、号、堂、记、居等商号336个之多。<sup>④</sup>桂林雁山镇附近的良丰圩位于桂柳运河旁,约100米的河段上共有码头5处7个,非常密集。每个码头均用1米(长)×0.5米(宽)的青石板垒砌而成。码头与街道之间,有约25米的落差。为防止洪水冲刷,两岸砌起了数十米的堤坝,每块石头重约100公斤,十分坚固。街中道路,全用青石板铺就,宽2—3米。良丰街附近的运河上还建起了一些十分气派的石拱桥,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会仙新桥、官塘桥、高桥、铜桥等。因其大都建在清朝的康熙和乾隆年间,当地民众习惯称为“康乾桥”。这

① 广西师范大学地方民族史研究所师生2010年10月调查统计。

② 《大圩公社志部分资料摘编·大圩镇部分资料》(未刊),现藏灵川县委志办。

③ 廖江主编:《灵川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420页。

④ <http://www.aibaohu.com/2009/10/20091030131008-42152.html>